日本国民参与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价值考量

——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摘要：

本文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分析视角，系统梳理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从大正时期的《陪审法》到平成时期的《裁判员法》的演进历程，揭示其改革背后的深层价值判断与制度逻辑。本文主张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国民实质性参与庭审核心程序，重构司法权力结构，以回应“审判中心主义”对司法民主化、实质真实发现与权力制衡的内在要求。裁判员制度通过融合英美陪审制与大陆法系参审制，在“司法专业化”与“国民主权”、“法律权威”与“民意监督”、“程序效率”与“实体公正”间寻求动态平衡，标志着国民从形式参与者转变为审判权的实质共享者。对比我国“人民陪审员制”中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模式，日本经验凸显了国民与法官共治审判核心环节、一案一任的责任机制以及精细化的程序保障对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关键作用。日本实践深刻表明，国民对审判核心程序的实质参与及相应的制度支撑，是提升司法公信力、打破司法官僚化桎梏、最终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路径，为我国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镜鉴价值。

关键词： 审判中心主义 裁判员制度 国民参与 司法民主 人民陪审员制度

国民参与审判的制度正当性之争，贯穿欧陆司法文明千年演进历程。自中世纪陪审制萌芽伊始，关于普通公民是否应当、以及以何种方式介入司法裁判的核心命题，始终萦绕在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尽管实证层面难言公民参与必然提升个案公正，亦无法断言职业法官垄断必然导向司法专断，然而当代法治文明已然形成一项基本共识：将国民纳入审判过程，不仅构成现代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标识，更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司法体系的普遍实践与价值选择。这种参与被视为司法权民主正当性的重要源泉，以及对法律专业主义潜在疏离社会的一种必要制衡。

回望这场跨越世纪的制度变革，日本在国民参与审判领域的改革实践以其鲜明的混合法系背景和独特的本土化路径，为我们深入审视国民参与审判的核心价值诉求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关键样本。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指引，重构国民与司法权关系在审判领域的互动关系，其探索或可穿透长久依赖的理论争议迷雾，揭示制度演进的深层逻辑。

在深入剖析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具体改革之前，我们首先梳理其法律现代化的独特历程，这构成了理解其国民参与模式选择的深层背景。学界普遍将日本法律现代化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治维新前，日本以中国隋唐律令为蓝本，通过大化元年的“大化改新”建立了封建法律制度，奠定了日本传统法制的基础；第二阶段是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迅速实现现代化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法律体系发生根本转向，大规模效仿欧陆法系。明治十三年（一八八零年）制定的首部现代刑法典主要借鉴法国在一八一零年颁布的刑法典，随后又吸收德国法律理念，形成了兼具法德特色的近代法律体系。第三阶段是二战后至今，在盟军占领的影响下，日本在美国影响下进行民主化改造，使日本法律体系呈现出“混合法系”的特征。正是这种复杂而独特的法律继受与融合过程，深刻塑造了日本司法制度的演进轨迹，尤其体现在在其对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模式的艰难探索中——从大正时期首次引入英美式《陪审法》遭遇挫折而夭折，到平成时期创造性地提出《裁判员法》，日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民参与审判改革之路。这条路径的曲折与最终形态，正是我们理解其以“审判中心主义”重塑国民与司法关系的关键切入点。

一、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演进

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百年演进，深刻映射了其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挫折与创新。这一历程始于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日本《陪审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首次引入英美式的陪审制度，该法历经五年筹备后于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开始实施，其启动日更于次年被定为了日本的“司法纪念日”。足见当时社会对这项改革的殷切期望——旨在通过国民参与实现司法民主化、普及法治观念并减少冤狱。

然而这项承载厚望的陪审制度[[1]](#footnote-0)设计也存在结构性的缺陷。由于“陪审更新”制度，审判长拥有近乎绝对的否决权，若其认为陪审团的“答复书”不当，即可启动“陪审更新”程序，解散原陪审团并无限次重组新陪审团重新审理，这实质上架空了陪审团的裁判功能，而且一旦经由陪审程序作出有罪判决，被告人的上诉权被严格限制，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且被告人还需承担高昂的陪审费用，严重阻碍了权利救济；其次陪审程序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分为法定陪审和请求陪审两类，但程序复杂，效率低下，且陪审员易受情感影响，实践中呈现出“重判倾向”。[[2]](#footnote-1)诸多存在问题的设计使得该制度在运行之初便步履蹒跚，最终未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

随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并强化战时体制，《陪审法》于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被正式“暂停”实施。在战后重建时期复兴陪审制的呼声再起，特别是律师界积极推动。但由于司法官僚体系的强力阻挠，最终复兴努力未能成功，仅在《法院法》第三条中象征性地保留“关于刑事诉讼，法律不得妨碍设立陪审制度”这一制度的条款，为未来留下了一丝微弱的可能性。作为某种替代或过渡方案，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出台了《检察审查会法》，首次引入由普通市民组成的检察审查会，赋予其对检察官不起诉决定的审查权，这成为战后初期国民有限度参与司法审查的唯一窗口。

沉寂半个多世纪后，国民参与司法的议题在世纪之交的日本司法改革大潮中强势回归。平成十三年（二零零一年）日本公布的《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该意见书提出三大目标方向即“建构能够满足国民期望的司法制度”、“扩大维系司法制度的法律职业”以及“确立国民基础”[[3]](#footnote-2)。其中， “确立国民基础”的核心要义，正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国民参与审判模式——裁判员制度。这标志着日本决心从根本上反思战前陪审制的失败教训，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新路。

经过周密的立法论证与准备，平成十六年（二零零四年），《关于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的法律》（《裁判员法》）正式颁布。并于平成二十一年（二零零九年）五月正式实施。该法彻底摒弃了纯粹英美陪审制的框架，转而创造性地融合了英美陪审制与大陆法系参审制的核心要素，设计出由法官与普通市民即裁判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全程协作审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混合模式”。

该制度是在借鉴英美法系陪审制与大陆法系参审制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司法传统与社会文化所创制的一种独具日本特色的“混合制度”。其核心架构承袭了大陆法系参审制的基本框架，即由职业法官与普通公民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包括量刑，打破了英美陪审制中法官裁定法律问题与陪审团裁定事实认定的职能分离。然而，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它又显著吸收了英美陪审制的关键元素，最为突出的是实行“一案一任制”，裁判员仅服务于特定案件，职责随案件审结而终止，这迥异于大陆法系参审制中参审员固定任期的普遍实践，也避免了长期任职可能引发的官僚化倾向；在选任机制上，其程序亦体现出鲜明的陪审制特色，强调随机性与广泛代表性，通过法定程序从选民名册中抽选候选人并审查确定，而非大陆法系常见的由地方议会推荐名单、法院筛选的模式。因此，日本的裁判员制度并非对既有模式的简单嫁接，而是基于比较法研究，有选择地融合两大法系制度精髓，并进行创造性本土化改造的产物，成功构建了一种以职业法官为主导、公民实质性共决、兼具临时参与性与程序效率、并符合日本国情的独特司法参与体系。

裁判员制度的落地生根，也标志着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完成了从战前形式化借鉴的挫折，到战后本土化创新成功的深刻转型，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模式”样本。

二、法律变革背后的价值判断

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演进绝非技术性调整，而是植根于日本社会对司法本质、权力配置及国家和公民关系的认知演变，其核心价值诉求在于构建符合现代民主的“审判中心主义”司法体系。

（一）司法民主化：国民主权在审判中的实践

无论是战前的《陪审法》还是战后的《裁判员法》，其根本驱动力都是打破职业法官对审判权的绝对垄断。明治维新后移植的欧陆式司法体系虽具专业性，却因官僚化倾向易与国民产生疏离。战后改革的核心价值判断在于，司法正当性需同时根植于法律专业性与国民共识。审判不应是“黑箱”，而应是国民能看见、能理解、甚至能参与的过程。这体现了对“主权在民”原则在司法领域的贯彻。正如《日本司法制度改革意见书》中强调，“国民应以统治主体及权利主体这双重主体身份有意识地参与司法及司法制度改革。同时，要建立并维持职业法律工作者——司法界之间的丰富多彩的信息沟通。[[4]](#footnote-3) 改革隐含着对权力制衡的考量。一方面，国民参与被视为对可能僵化或专断的司法官僚体系的一种外部监督和制约，可以防止司法权滥用。另一方面，法官与裁判员共同评议案件，使"主权在民"原则在审判核心环节具象化。

国民亲身参与庭审这一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核心领域，将“市民常识”注入司法过程，既消解法律脱离社会现实的风险，亦使判决契合普遍正义观，显著提升司法公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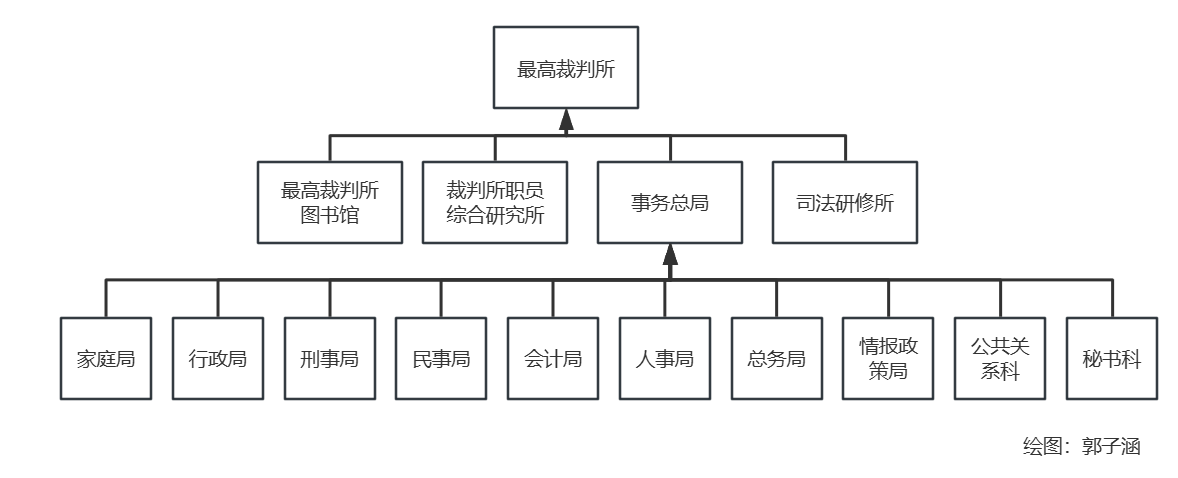
（二）追求“实质真实”与冤案防范的考量

昭和时期的陪审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导致了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更因陪审员易受情感支配形成重判倾向，而战后的《裁判员法》吸取经验，参用了“混合制度”而非纯粹的陪审制，并且大幅减少裁判员人数，通常由三名法官和六名裁判员或更小规模组成合议庭，简化程序，其设计融入了对效率和可行性的价值考量，目标在保障国民参与和审判质量的同时，避免制度陷入瘫痪现代社会案件日趋复杂，纯粹依靠职业法官处理所有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面临能力与公信力的双重挑战。裁判员制度也被视为一种分担法官压力、利用国民智慧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策略。

（三）司法独立性与民主监督的动态平衡

近代日本刑事司法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周密侦查、慎重起诉、法庭细致入微审理和高的定罪率等为特点的“精密化”司法。精密司法虽然具备程序精密和结果精准的优点，但也存在审判流于形式等问题。一方面, 职业法官群体因高度专业化形成封闭体系，裁判思维脱离社会常情，削弱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最高法院通过人事任免权实质控制下级法院，形成“金字塔型司法官僚体制”[[5]](#footnote-4)， 虽然减少了外部对司法的干预, 却无法使下级法院法官有效抵制上级法院法官的干预, 司法独立沦为空洞承诺。而裁判员制度的创设正是对上述危机的结构性回应，普通市民以裁判员身份直接介入庭审核心程序，将多元社会经验注入事实认定与量刑评议，迫使职业法官直面公共理性，重构司法与社会的信任纽带；国民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形成“决策共同体”。合议庭内法官与六名裁判员协同裁判，合议庭外上级法院因民意参与难以直接干预个案，实质瓦解了官僚体制对审判权的内部控制。国民参与制衡的关键正是庭审实质化过程——裁判员全程参与证据调查、证人询问与法律辩论，通过当庭形成的“程序共识”阻断庭外干预渠道。这不仅保障了审判的独立性，更使“司法独立”从制度宣言转化为以国民意志为根基的实践范式。

日本有关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演进，本质上是以审判中心主义重构司法哲学的历程。裁判员制度通过国民实质参与庭审核心程序，在民主正当性、实体公正性、权力制衡性三重维度实现价值革新。这一制度既是对“精密司法”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也为调和司法专业化与民主化、法律权威与国民主权的永恒命题，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经验。



**图1 日本最高法院结构图**

三、中日陪审制度比较：价值异同与镜鉴

对比中日两国的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可见，尽管两国共享“司法民主化”的目标，却在制度哲学与实践效能层面呈现出断裂，这种断裂不仅体现在技术设计上，更根植于对“审判权本质”与“国民在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的认知分野。

1. 参与深度与权能：从“分权制衡”到“专业隔离”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革新性突破在于，将国民参与内化为审判权的结构性组成部分。裁判员全程深度参与证据调查、法庭辩论，更在闭门评议中与职业法官平等协作，共同负责从事实认定、罪责判定直至具体量刑的完整裁判过程。其核心逻辑是打破专业壁垒，通过法官与市民在决策场域的权力共享与智慧交融，共同形塑裁判结果，真正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下国民作为裁判主体的地位。

然而中国“七人合议庭”模式下[[6]](#footnote-5)，其“事实审与法律审”的二元分割架构，实质上构筑了一道隐形的专业壁垒。人民陪审员仅对“事实认定”享有表决权，而对至关重要的法律适用包括定罪量刑的核心环节无权实质性参与。此种设计虽然意在规避外行会干扰专业判断的风险，却在无形中割裂了审判决策的有机整体性——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本是不可分割的认知过程，强行切割不仅违背司法认知规律，更使得人民陪审员沦为法庭民主的象征性点缀，其参与难以触及审判权的核心，与“审判中心主义”所要求的庭审实质化与心证形成过程的完整性背道而驰。

（二）制度效能：认知鸿沟与“实质性参与”困境

中日公众对国民参与审判制度的认知鸿沟，直观反映了制度在社会土壤中扎根深度的差异。数据表明，我国社会公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较低：43.9％的被调查人员表示没听说过人民陪审员制度，对陪审员角色定位普遍模糊；更有近30％的受访民众期待陪审员具备法官同等专业素养[[7]](#footnote-6)。这深刻表明，社会对陪审制度的理解仍停留在将其视为“准司法辅助者”的初级阶段，远未形成“国民作为裁判主体”的公共意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超90%的日本民众对裁判员制度有明确认知，清晰了解其担任资格、职责权限与核心角色。[[8]](#footnote-7)这标志着日本社会已成功塑造并广泛接纳了“国民是司法裁判的共同担当者”这一核心理念。

这种认知鸿沟背的根源，在于中国陪审制度深陷“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能效困境。究其原因是由于双重结构性缺陷：在微观层面，评议机制存在权力失衡，法官主导事实问题讨论时，其专业话语常通过争议焦点归纳隐含预判，无形中消解陪审员意见；同时因缺乏类似日本《裁判员法》第六条规定的“评议隔离制度”，陪审员独立性易受庭外因素的干扰；在宏观层面，中国司法体系承袭的“精密司法”传统，其高度高度专业性的运作模式，与引入国民参与的民主化诉求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国民参与沦为司法民主的装饰符号，未能像日本般有效打破“法官官僚主义”与“司法民主化”的内在张力。这种体制性困境导致陪审制既未实现权力制衡功能，亦未实质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

（三）对中国的镜鉴：构建实质性参与的制度路径

日本经验揭示，破解“陪而不审”的困局需要从制度根源，重构国民在司法中的角色定位。首先，可以通过废除事实审与法律审的二元分割模式，打破专业壁垒，赋予陪审员完整的定罪量刑表决权，以立法得形式明确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核心环节的共决地位，使参与权从形式走向实质。其次，可借鉴“一案一任制”以防止陪审员选任的官僚化倾向[[9]](#footnote-8)，并引入类似日本《裁判员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法定评议隔离规则，保障评议过程免受庭外干扰，从而有效缓解我国陪审员“审而不议”的困境，确保其判断的独立性。

然而，考虑到我国案件体量庞大、司法资源有限的实际国情，完全推行上述措施在实践中可能面临资源消耗过大的挑战。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建立梯度化的参与机制，对于重大案件，应该充分实施前述赋权共决、一案一任及严格评议隔离等核心措施，确保国民实质性参与；而对于相对简单的案件，则可在适用程度上有所调整——例如，在陪审员选任上不一定每次都严格采用“一案一任”，或在评议隔离的要求上适度灵活，同时更多地保留法官的专业裁量权，以此在保障司法公正与国民参与实质性的前提下，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制度运行效率。

结语

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从《陪审法》的挫折到《裁判员法》的成功转型，本质上是一场以“审判中心主义”为指引、重构司法权力哲学的深刻变革。裁判员制度通过确保国民实质性、全程化、平等化地参与庭审核心程序，在民主正当性的夯实、实体公正性的提升、权力制衡性的强化三重维度实现了价值革新。它既是对本土“精密司法”传统的批判性扬弃，也为调和司法专业化与民主化的张力、法律权威与国民主权的统一这一难题，贡献了独具日本经验的“混合模式”方案。

日本司法制度变革的密钥，在于将国民从“司法旁观者”转化为“裁判共同体构建者”：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通过废除二元分割与程序保障，使民主实质参与打破形式壁垒；通过分层设计即梯度参与机制，兼容司法效率与民主诉求，实现“精密司法”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唯有使国民在审判权核心领域获得制度化的主体地位，司法改革方能突破“陪而不审”的困局，真正激活“审判中心主义”的内生动力——这既是对日本经验的深刻领悟，更是中国司法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进阶之路。

参考文献

一、 学位论文：

[1] 黄宣植：《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吉林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

[2]黄旭:《论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南京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二、 专著（含译著）：

[3] [日]夏树静子著，李昊译：《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三、 期刊文章：

[5] 刘文峰：《日本精密司法经验与启示》，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11期。

[6] 许千钧, 刘方权：《日本刑事诉讼裁判员制度十年检视》，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7] 丁相顺：《日本裁判员制度中的民众参与和专业制衡：以在日留学生“陈某某杀人案”的审理为例》，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5期。

[8] 王云海：《日本的刑事司法改革：社会的“法化”还是法的“社会化”？》，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2期。

[9]梁欣：《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司法改革》，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10]张允起：《日本宪法诉讼的理论、技术及其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5期。

[11]庄志,王德强：《试论中外陪审制度之异同——兼议人民陪审员制度之重构》，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9期。

[12]周长军,韩林均：《日本裁判员制度的运行效果研究——兼及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第一版。

[13] 方金刚, 胡夏冰：《国民参与审判制度：点评与展望》，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31日。

[14]陈佳妤：《105年度选送国外专题研究报告之日本裁判员审判实务暨实证调查研究》，2017年12月发布。

[15]最高人民法院问答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问答），2004年11月发布，载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附录：

整理日本近代法律改革关键时间年表（侧重司法制度与国民参与审判）

| **时期** | **年份** | **法律/事件** | **内容/意义** |
| --- | --- | --- | --- |
| ****明治维新后**** | 1889年 | 《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 | 确立君主立宪制，设立帝国议会。司法权形式上独立，但受行政权较大影响。奠定近代国家法律体系基础。 |
| 1890年 | 《裁判所构成法》（法院组织法） | 确立近代法院体系（大审院、控诉院、地方法院、区法院）。 |
| 1890年 |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 | 日本首部近代诉讼法典。引入国家追诉主义、公诉制度等。 |
| 1890年 | 《行政裁判法》 | 设立行政法院（仅东京一所），审理行政案件。体现大陆法系司法二元制特点。 |
| ****大正时期**** | 1923年 | 《陪审法》 | 日本首次引入英美式陪审制度。规定仅适用于刑事案件，陪审员12人（30岁以上男性），仅就事实有无进行答复，审判长有权否决并无限重启（“陪审更新”），被告人上诉权受限且负担重。 |
| 1928年 | 《陪审法》正式实施 | 开始实际运行陪审审判。 |
| ****昭和时期**** | 1943年 | 《陪审法》暂停实施 | 因战时体制强化及制度本身缺陷而中止。 |
| ****战后改革**** | 1946年 | 《日本国宪法》（和平宪法） | 确立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三原则。明确规定司法权独立（第76条），最高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拥有违宪审查权。 |
| 1947年 | 《法院法》 | 废除旧的法院体系，建立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的新体系。第3条保留“关于刑事诉讼，法律不得妨碍设立陪审制度”的可能性。 |
| 1948年 | 《检察审查会法》 | 设立检察审查会制度。由普通市民组成审查会，对检察官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否适当进行审查。 |
| 1948年 | 修订《刑事诉讼法》 | 引入当事人主义元素（如起诉状一本主义、传闻证据规则初步确立），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 |
| ****平成时期**** | 2001年 | 《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 提出司法改革三大目标：“建构能够满足国民期望的司法制度”、“扩大维系司法制度的法律职业”、“确立国民基础”。核心之一是创设裁判员制度。 |
| 2004年 | 《关于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的法律》（《裁判员法》） | 创设法官与市民共同审理重大刑事案件的裁判员制度。规定合议庭组成（通常3名法官+6名裁判员）、选任程序、评议规则（国民与法官共同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量刑，判决需含至少1名法官意见）等。 |
| 2009年 | 《裁判员法》正式实施 | 裁判员制度开始在全国运行。 |
| ****令和时期**** | 2020年 | 《裁判员法》修订（引入“在线评议”等） | 应对新冠疫情等挑战，完善程序。 |

1. 参见[日]夏树静子著，李昊译：《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82页。昭和时代的陪审制度：仅以刑事案件为对象，分为法定陪审和请求陪审两大类，陪审员人数为12人。均为日本三十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公审审理结束后，审判长需要向陪审员递交征询犯罪事实有无的“问书”。陪审员讨论并选出审判长答复，答复结果以过半数的意见为准，审判长接受“答复书”应让书记员宣读结果。审判长与陪审法官就“答复书”内容进行合议，认定答复正当的情况下，审判长将在法庭之上宣布结果，如果陪审答复“不充分”，则审判长当庭宣布无罪，陪审答复“充分”，则检察官进行论告与请求量刑，辩护律师进行最终辩护。但是如果审判长认为陪审答复不正当的情况下，可以不采纳答复意见，并终止之后的法庭流程，重新组织陪审团，开庭重申。这种情况被称作“陪审更新”，可以无限进行。陪审审判做出判决后，被告人即便不服，也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footnote-ref-0)
2. 同前注，第79页。 [↑](#footnote-ref-1)
3.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译:《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书意见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footnote-ref-2)
4. 同前注，第6页。 [↑](#footnote-ref-3)
5. 参见刘文峰：《日本精密司法经验与启示》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11期，第66-70页。日本司法体系被称为“金字塔型司法官僚体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日本法院体系呈金字塔状，顶层为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其下依次为高等裁判所（高等法院）、地方/家庭裁判所（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及简易裁判所（简易法院）。下级法院在审判业务（通过上诉审查）及行政管理上均受上级法院制约，参考图1 。

   （2）人事权的中央集权化：最高裁判所下设“事务总局”，实际掌控全国法官的任命推荐、晋升考核、定期轮岗及惩戒权。法官职业生涯受行政化管理，常因人事调动（每3-5年强制轮换）削弱其独立性；

   （3）宪法虽保障法官独立（《日本国宪法》第76条），但事务总局通过人事控制形成“隐性威权”，导致法官裁判时可能趋附上级意向，抑制司法创新。此体制与“精密司法”传统共生，加剧刑事审判的形式化风险。 [↑](#footnote-ref-4)
6. 参见《中国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二条。 [↑](#footnote-ref-5)
7. 最高人民法院问答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问答），2004年11月发布，载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footnote-ref-6)
8. 参见陈佳妤：《105年度选送国外专题研究报告之日本裁判员审判实务暨实证调查研究》，2017年12月发布。 [↑](#footnote-ref-7)
9. 参见黄旭:《论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南京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footnote-ref-8)